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會見傳媒談話內容（只有中文）

\*\*\*\*\*

以下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今日（六月十三日）出席策略發展委員會行政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只有中文）：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今日策略發展委員會行政委員會討論了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的問題，特別要強調的是國際競爭力，即是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即我們的市場、我們的人才，基本上都是來自國際，而我們的對手亦是國際對手。談到這一點很多委員都認同一點，認為值得各方面留意的是，香港是一個城市而不是一個國家。因此我們的本地市場是相當細小，不論是人才的市場，或是貨品的市場。特別要從這一點出發來思考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問題，因此一定要用一個開放的胸襟和視野來審視香港國際競爭力如何提升的問題。當然提升國際競爭力牽涉到很多方面，我們提供給委員的文件已經相當詳盡。但是在討論之下，我發覺獲益良多。就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問題，其實很多東西我們大致上、社會上已經很清楚應該要做些甚麼，特別因為今次討論是因應上幾次的討論所引發出來的一次總結性討論。我們幾次討論過，香港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定位問題，我們亦討論過香港在國際上的定位問題。因此今次的討論基本上是一次總結性的討論，就圍繞提升競爭力的問題。

大體來說，有幾個重點值得大家留意的。第一點涉及到教育和人才的問題，這點是眾多的策發會委員會均着重的問題。即是提升國際競爭力，我們一定要招攬國際上的人才，和提升我們的教育質素。對於人才方面，我們覺得要盡量大開方便之門，讓各地人才都可以進入香港。藉此不單只提高香港人才的數量，同時亦可以刺激本地人才的發展和成長。

第二點突出開放性，即是越開放香港的競爭力越大。所謂開放性是甚麼呢？這涉及到幾個方面，第一個就是不能攬本地的保護主意，即是說我們的行業、我們的專業一定要盡量開放，不能攬保護主意來窒礙競爭者的出現。特別有一些委員提到我們有一些專業有保護主意成份，令到我們不能吸引足夠人才來香港發展，有人提及法律服務，有人提到醫療服務。第二個就涉及到國際聯繫的問題，有委員提到國際上對香港的注意力是否減少了？即是國際上是否認為香港越來越走向本土化呢？即是那種國際視野、國際性是否減弱？是否外面對我們的認識減少了，甚至是對香港存在着誤解呢？因此而喪失了來香港發展的機會，或是低估了香港發展機會呢？這裡有人提過我們要大量、大力的在國際上推介香港，令到國際人士多些了解香港和知道香港所能夠提供的機會，特別是要他們知道香港可以作為中國和世界接軌的橋樑角色，這是涉及所謂開放性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涉及到我們如何利用國家所提供的機會，來提升我們的競爭力。這提到我們如何善用國家所給予香港的各種各樣有利於香港發展的政策，特別現在在「十一·五」規劃之下，國家特別着重香港作為航運、金融和貿易中心的地位。這些地位如何鞏固和強化，

來配合國家的政策使香港在這幾方面加強發展。由此而引出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推動競爭力提升的同時，應該走甚麼策略呢？是全方位跟別人競爭，或只是選擇一些較具競爭能力、較具競爭優勢的行業或產業來跟別人競爭呢？似乎比較多人的意見認為，既然香港只是一個城市而不是一個國家，沒有需要追求各個領域都有發展，各個領域都有存在；只是應該集中我們覺得認為最有優勢的地方，來鞏固和發展它的競爭優勢，特別提到的是金融和貿易，這兩方面特別重要，接着就是旅遊和航運等。除了這些現有優勢的產業外，是否還有需要發展新的產業呢？有人提到我們的教育是否可以作為一種產業出口呢，特別是高等教育。我們的醫療服務可否作為一種產業呢？香港是否具備發展生物科技的條件呢？我們的環保工業是否可以發展呢？這些所謂新興產業在發展過程當中，是讓它們自動自覺出現，或是政府可以扮演一個角色來促進它們的出現呢？這牽涉到另一個很有爭議性的問題，就是香港在提升競爭力過程當中，政府的角色問題。發覺有不少委員，並不單只來自工商界，甚至來自勞工界的都認為，政府一直以來膽色和魄力不足，即是過份拘泥於給別人說偏幫某些行業，向某些機構傾斜，因此而不能夠大膽地去因應香港的發展需要，而促進某些行業、或某些專業的發展。當然政府有它自己的苦衷，即涉及到公平公正、平等競爭，以及防範給別人說官商勾結的情況。但是有不少委員認同這些顧慮是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在未來發展過程當中，政府是有需要通過和社會討論，以公平開放方式為某些行業的發展提供某些條件。這樣就可以既促進香港發展，又可以避免給別人說政府向某一方面傾斜。

說到這裡，最重要的一點是，你要與社會討論，究竟是否需要促進某些行業的發展；第二，在促進過程之中，是否被人覺得公平公正；第三，是否需要引入一些所謂專家論證。與及考慮到這些行業，他們的發展是否帶動到整體的經濟發展或整體的社會發展。即是他們的發展本身不是只是對參與該行業的人有利，而是全體的香港人都是受益。如果是這樣的話，即使向某些行業提供某些有利條件，社會都未必一定會反對。我們在會上聽到一個比較明確的觀點、實際即是說有不少委員開始覺得我們過往所講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在現時香港面對發展契機與挑戰並存之際，是否仍然要比較僵硬地堅持，或是應該作出某些變通呢？

在其他方面，有人提議到我們在鞏固固有優勢的過程當中，是否做得不夠呢。例如我們的基礎建設，在最近的十年、八年，好像停滯不前。即是沒有大型的基建投資，起完新機場之後好像便沒有甚麼了，變成不能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又不能強化香港的競爭優勢，更不能提供就業機會，又不能創造投資環境。這是否一個適當的辦法？這亦引伸至第二個問題，要推動基建投資及其他的經濟政策的改動，涉及一個棘手的政治與政制的問題。不少委員提到我們的政制是否令到政府決策及社會凝聚共識異常困難；令到政制、令到各方面做事都受到諸多阻滯，拖延決策程序，及阻礙政策的推行。因此，最後又回到政治及政制的問題。當然講完之後，並沒有即時的解決辦法，只是指出現時香港需要快速制定政策及推行政策，以便：第一，利用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及第二，不至於落後於其他地方。我們制定政策及推行政策的過程，是否應該推快點。當然這個問題，大家承認政制上是有不少的障礙，但通過社會廣泛討論，凝聚共識，是否可以克服政制上某些對制定及推行政策所引發出來的困難呢？又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意見是，香港低檔次的服務業的成本是否太高呢？影響到整體香港

的競爭能力，所謂低檔次的服務業包括酒樓、交通運輸、及其他類型的個人服務，是否比鄰近地區太貴呢？令到提升整體的營商成本呢？這些是種種比較枝節的東西。

大體上我覺得，整體來說，要強化香港的開放政策，加強人才的匯聚，令到我們整個社會及經濟體系的運作更加靈活。強化與中央與內地的合作關係，以至於調整政府在政制發展的過程中的角色。這些事項是比較多人關注，作為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的一些重要考慮。

完